

南朝刘宋皇室乱局探析

陈俊川

(陕西师范大学 历史文化学院, 西安 710119)

摘要:刘裕建宋带来的社会发展没有使皇室安稳如山,反而祸乱频发,臣弑君、子弑父、兄弟互相屠戮、伦常败坏等,最终亡国于部下萧道成之手。究其原因,乃当时社会处于急剧动荡和大转型时期,寒人与士族为了各自的利益,以皇室为中心展开角逐,加之刘裕及皇族子弟自身文化水平较低、教育失策、猜忌心理严重,内外交困,最后成为社会转型和士庶斗争的牺牲品。

关键词:刘宋;皇室;士庶斗争;门第;家风

中图分类号:K239.1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6390(2018)06-0041-04

刘裕建宋不仅带来南方政局的相对稳定,而且推进了寒门阶层地位上升,成为当时南朝的主导者。然而,国家的发展并没有使居于统治顶端的皇室安稳如山,反而祸乱频发,臣弑君、子弑父、兄弟互相屠戮、伦常败坏等,以致最终亡国于部下萧道成之手。究其原因,乃内外因相互作用的结果,其对后世的影响也极其深远。

一、南朝刘宋皇室乱局概述

刘宋共历八帝,在皇位传承过程之中皇室内乱几乎没有停止,除刘裕、少帝义符和末帝顺帝准不是经历皇室内斗而夺位外,其余都经历了一番宗室内斗才登上帝位。而刘宋乱局的开启者,竟是刘裕自己。南朝以前,对于前代君主特别是禅位君主,多不曾弑。刘裕却坏了这个规矩:“宋武禅代,鸩毒旧君……其臣习见,方为新君地,不暇为旧君计,故嗟跌至此也。”^[1]中国古代,弑禅让之君不仅违背礼法,而且与世人的传统理念不相符合。

刘裕先后谋杀东晋两位皇帝,分别是安帝和恭帝。安帝之死,乃是“高祖使韶之与帝左右密加鸩毒”^{[2]1074};恭帝作为禅位之君,刘裕欲杀之,“以被掩杀之”^{[2]1990}。刘裕以臣弑君有违儒家礼法。清人王夫之认为,宋不被“神人所喜”,是因为“恶莫烈于弑君”。自刘裕开启这一恶例之后,“受夺之主必死于兵与鸩”^[3]。刘裕死后,少帝于永初三年(422年)即位。刘裕临终前令徐羨之、傅亮、谢晦辅佐少帝,但徐羨之等人窃取国柄,为所欲为,先是在景平二年

(424年),废庐陵王刘义真“为庶人,徙新安郡”,后又遣使“杀义真于徙所”^{[2]1081-1082}。随后,徐羨之等人使用对待庐陵王刘义真的手段对待少帝义符。景平二年(424年),徐羨之等人以少帝“居处所为多过失……废为营阳王”,六月即派人“弑帝于金昌亭”^{[2]45}。少帝之死亦如刘裕弑晋安、恭二帝,以臣弑君,非常礼。范泰有言:“吾观古今多矣,未有受遗顾托,而嗣君见杀,贤王婴戮者也。”^{[2]1070}依范泰之言,徐羨之等人违法乱礼古之未见,周公辅成王、霍光辅昭宣二帝也是下臣受命辅佐幼主,却不曾犯弑逆之罪。相较于古人,徐羨之等人的行为实为大逆不道。“《春秋》之义,‘君亲无将,将而诛焉’。”^[4]刘裕弑君、徐羨之等人弑少帝都违背了这一理念,背离了儒家礼法。

徐羨之等人弑少帝继而扶持文帝即位,结果终被文帝所杀。文帝虽有才能,却招致太子行弑,宗室乱象未见改观。吕思勉对此评论说:“宋世宗戚之祸……发于元凶之弑逆。”^[5]刘裕弑君为后人留下可以弑上的先例,致使下臣杀少帝,之后大臣联合废帝、杀帝之事常有。而太子劭弑文帝,进而屠戮宗室。杀机一起,后来宗室亦多以此为先例,宗室杀伐不休。刘裕与太子劭可看作刘宋乱局的两大发端。

太子劭颇得文帝喜爱,其与始兴王濬多有过失,又以巫蛊之术欲文帝早死,后东窗事发,铤而走险发动宫廷政变杀死文帝。除弑帝外,劭还杀江夏王义恭十二子,杀长沙悼王瑾、临川王晔、桂阳侯凯、新渝侯玠等,甚至还欲杀三镇士庶家口,后被制止才放

收稿日期:2018-06-22

作者简介:陈俊川(1994—),男,安徽寿县人,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魏晋南北朝史。

弃。宗室间的残杀从此更加变本加厉。最终,刘劭被武陵王刘骏所灭。刘骏在宗室至亲之间的血腥拼杀中登上皇位,是为孝武帝。但刘骏其人“性严暴,睚眦之间,动至罪戮”^{[2]1532},群臣、兄弟之间也多猜忌,以致宗室相斗。平刘劭后不满一年,丞相、荆州刺史刘义宣等“孝建元年秋冬举兵”^{[2]1190}。五年后,竟陵王诞反,孝武帝亲御六师杀之,最后还进行屠城。为了强化统治、巩固皇权,孝武帝广封幼子为各州刺史,坐镇地方。幼子既孤又弱,多被佐臣控制。随着年岁日长势力坐大,兄弟之间又多猜忌,其结果又变成一轮新的屠杀。宗室之间,几乎不存血脉亲情,唯剩对权力的贪恋。

刘宋诸帝自身伦理混乱。孝武帝曾在生母路太后房内留宿^{[2]843},前废帝在建安王休仁即明帝面前使左右淫逼其母杨太妃^{[2]1236}。上行下效,刘宋公主之淫乱便不足为奇。如新蔡公主是前废帝姑母,前废帝却以宫女诈死替身改姓为由将其娶到宫中纳为贵嫔夫人。更有甚者,孝武帝之女山阴公主为求“男女平等”,废帝便为她安排三十名面首。公主们不仅伦常败坏,而且在政治斗争中也起到重要作用。东阳公主在刘劭之乱中引荐严道育,其家奴陈天兴参与刘劭巫蛊之事,或直接或间接对刘劭作乱发挥了作用。会稽公主在其子徐湛之牵涉刘义康案后出面向文帝求情,以高祖旧衣示之,“湛之由此得全也”^{[2]1218}。

刘宋宗室杀戮未有停歇。孝武帝死后,前废帝子业继位。子业“凶悖日盛,诛杀相继”,戴法兴、沈庆之相继被杀,弟刘子鸾、刘子师等亦被杀,一时“内外危惧”^{[6]45}。此外,刘子业还打算杀掉剩下的六个叔父,其中建安王休仁、湘东王刘彧和山阳王休祐最让其猜忌,欲加杀害。朝臣生死无常,惧怕无比,刘彧和大臣商议废帝,最终“寿寂之怀刀直入”^{[6]45},把子业杀害,刘彧继位为明帝。明帝继位是一种非常态下的兄终弟继。废帝死,理应先从孝武帝诸子中选立君主,明帝作为孝武之弟,次序次之。但明帝依靠王玄谟等人消灭了以刘子勋为首的孝武诸子,“孝武帝二十八子……为明帝所杀者十六”^{[7]241},同时反叛的同党都被诛杀。一时之间,刘宋宗室凋零,少有存活,“其骨肉相残若此之甚”^{[8]1454}。

明帝死,后废帝刘昱继位。刘昱其人更是变本加厉,孝武帝有二十八子,“明帝杀十六,余皆帝杀之”^{[6]58-59},最后自己被杨玉夫和杨万年所杀。明帝大杀宗室,虽然是为了保障太子及皇位的稳固,却如同竭泽而渔、焚林而猎,把依靠的力量也剪除殆尽,只能任用异姓亲近大臣出镇制约地方。这一做法看似明智,但主幼臣强,最终异姓坐大、国不复国。太

子即位后无德,死后萧道成迎刘准为帝,是为顺帝。萧道成在权势大增后不仅把顺帝降为准阴王,而且“监人杀王……齐人德之”^{[6]61}。臣下弑君,亦如同刘裕弑前朝帝君,亡国之后血脉不存,形成一个恶性循环的历史怪圈。

二、南朝刘宋皇室乱局的原因

“子孙繁衍,为帝为王……极一世之福;及其败也……横尸喋血,斩艾无噍类,欲求为匹夫之传家保世而不可得。”^{[7]241}刘宋皇室祸乱频发以至于亡国灭种,是多种因素综合作用导致的。其中,既有当时社会处于转型期,社会大背景影响下刘宋政权的转型失败,也有高门与寒族之间以皇室为对象进行角力的影响。外因往往通过内因起作用,刘宋政权自身的因素更不能忽视。刘宋皇族文化底蕴缺失、家庭教育失常、统治政策失衡和性格畸形多疑等多种因素,导致刘宋一朝乱象丛生。

(一) 外因

东晋一朝是门阀士族鼎盛、“王与马共天下”的时代,“王与马的结合,开启了东晋百年门阀政治的格局”^[9]。但刘裕建宋代晋带来的不仅是改朝换代,更多是对门阀士族的打击,以及社会风气的新一轮更化。皇权在刘宋时期得到重塑,整个社会呈现出一种新陈代谢的状态,新一轮的社会转型开始启动。

魏晋以来,儒学丧失独尊的地位,其所倡导的忠君思想、三纲五常等已不被当时完全认同,武力夺取政权是这一时期的显著特征,如北方少数民族入主中原便是依靠武力征服,刘裕更是以军事统帅身份而不是以贵族身份建立了刘宋王朝^[10]。在魏晋时期,军人要系统学习儒家文化很难,刘裕“少事戎旅,不经涉学”^{[2]1120},以他为代表的军人在学习儒学方面是不足的。这样的人建立政权之后,不得不尊崇儒学,一方面是为了笼络士人,另一方面是为了促进国家的文治教化,因为国家终究不能依靠武力进行治理。

社会大动荡给时人带来严峻的生存危机,能够生存下来是人追求的第一要义,过去儒家所倡导的“三纲五常”便居于次等地位。政局动荡之际,国家转瞬而亡,士族不再以忠君固守,“君统的变易,朝廷的更迭,反而一似与自己无关。在禅代废立之际,世家大族不是不预闻,便是帮助篡位,均以自己门第利益为转移”^[11]。对于士族而言,国家利益不是第一位的,“不再以国家为重,传统的忠君理念自然束之高阁,于是否定君臣关系、改变传统人伦关系、不尊礼法、缘情制礼等言论和行为,在当时有很多”^[12]。刘裕弑君,徐羨之等人杀少帝,孝武帝、明

帝等大杀宗族子弟皆违背了传统的“三纲”,这在之前是罕见的,但在南朝却屡次出现。可以说,这正是社会转型时期各种因素对政治的渗透与影响之下呈现的阵痛。

寒门在魏晋时期的崛起之路坎坷而艰难。以曹魏与西晋为例,陈寅恪认为,魏、晋的兴亡递嬗,不是司马、曹氏两姓的胜败问题,而是儒家豪族和非儒家寒族的胜败问题^[13]。西晋代魏,儒家贵族战胜了非儒家的寒门。延至东晋,门阀士族的政治地位、经济实力都更加巩固,难以动摇,寒门在当时崛起是十分困难的。刘裕以寒门身份建立刘宋政权,使寒门有机会打破昔日“上品无寒门”的社会政治格局。寒族与士族在刘宋政权中以皇室为对象的角力是刘宋皇室乱局的一大推力。士族发生地位危机寻求改变,寒族迫切希望进位,皇室成为二者进行权力角斗的“中心”,历次内乱都能看到寒、士两族的身影与动作。

相对于士族,寒族更为刘宋皇室所信任并引为依靠的力量。在皇室内乱中,寒人与皇室互相利用,寒人既被皇室信任参与政治活动与夺权活动,寒人也利用宗室的矛盾使自己的权益得到提升和维护,或打压士族的生存空间。寒人在刘宋皇室内乱中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刘劭密谋弑杀文帝夺取帝位,利用陈叔儿、詹叔儿、斋帅张超之、任建之等心腹低品级武职人员,杀害文帝、徐湛之和王僧绰等人,随后大加封赏,“并将校以下龙骧将军带郡,各赐钱二十万”。寒人以扶助刘劭行弑乱以“有功之臣”得到提升。刘劭为获得寒人更多好感与支持,“我为卿除徐湛之也”^{[2]1618},博取曾受徐湛之打压的鲁秀好感,寒人之势在刘劭心中高于门阀支持。

孝武帝、明帝在武人和寒人的拥戴下夺得帝位^[14],因而“孝建、泰始,主威独运……权不外假……事归近习……人主谓其身卑位薄,以为权不得重”^{[2]1531}。皇帝之所以认可寒人,是因为寒人对他们确有帮助。如戴法兴出身卑微,“少卖葛于山阴市”,但“颇知古今,素见亲待”^{[2]1532},受到孝武帝重用。孝武于巴口建义,“戴法兴与典签戴明宝、蔡闲俱转参军督护……大明二年,三典签并以南下预密谋”^{[2]1532}。特别是典签董元嗣为孝武帝传信结果被刘劭拷打而死,忠心可鉴。明帝继位也与寒人阮佃夫的协助并与其密谋杀害前废帝关系密切。桂阳王休范打算起兵,“密与典签新蔡人许公于谋之”^{[2]1353},也是寒人为其谋划相关事宜。寒人广泛参与皇室内斗,是刘宋政权重用寒人、压制士族政策的结果。孝武帝后寒人参掌机要,在皇室乱局中发挥的作用更大。

士族作为刘宋建国以来一直提防和小心的对象,虽然仍被授予高位,但权势在不断削弱。为了维护自身和家族的利益,士族也在寻找可以依靠的力量遏制寒人。以“元嘉之治”得名的宋文帝在其政治活动中,对门阀士族既限制又重用,在重用士族人物的同时以寒人掌机要来限制士族的权力。文帝还重点培养彭城王刘义康作为皇室的力量对士族和寒人形成双重压制。士族面对皇室大权在握且被多处掣肘,依靠皇帝已不可能,只能向当时最有权势且被文帝重视的刘义康靠拢。以刘湛、刘斌等人为代表的士族称“天下艰难,诘是幼主所御”,义康没有反驳,他们更加急迫“常欲倾移朝廷,使神器有归”^{[2]1184},使刘义康犯上作乱,最后被赐死,门阀士族也因此受挫。但士族在随后太子劭的废立问题上又有大动作,主张废太子立自己所主张的人选,“及将废立……(徐)湛之欲立随王诞,江湛欲立南平王铄,太祖欲立建平王宏,议久不决”^{[2]1222}。最后刘劭兵变弑帝,得知王僧绰打算废掉自己和其余诸王的家书,杀徐湛之及其门客多人。士族不甘屈服,寒人不甘低位,二者在朝堂之上互相争斗,皇室成为其角力的“中心”,宗室内乱基本上都有士庶参与并进行斗争,导致皇室乱局越闹越大。

(二) 内因

刘裕出身低微,没有高门大族的背景,文化水平低,家族文化底蕴积累较少。相较于门阀士族的文化积累,刘宋皇室的积累时间太短,皇室成员的文化涵养以及个人素质较差。刘裕对于皇室宗族子弟未能进行有效教育,以至于后来者或多或少都受其影响,当然这也与刘裕在位时间不长有关。

刘裕晚年得子义符,甚悦,“宠树营阳,恣其嗜欲,群小竞进”^{[15]395}。晚年得子,刘裕欢喜异常,对于幼子的宠爱是予取予求不加限制,但一味宠溺而不加教育却失教养之职。正常的皇室教子应是“三师并辅其志,进退俯仰,如值绳准”^{[15]396},刘裕未得教子真意,以至于死后其子义符“喜容表于在戚……优倡管弦,靡不备奏”^{[2]44}。服丧没有愁容,却自为嬉戏,伦理失度。文帝对太子劭宠溺有加,换来的是太子劭不念父子之情弑杀文帝。明帝在后废帝幼时不加管教,结果其继位之后性格喜怒无常,“天性好杀,以此为欢”。刘裕及其后来者文帝、明帝等人教子无方,对其子宠爱有加而没有教导他们正确的做人准则及为君之道,相比于门阀士族“士大夫子弟,数岁已上,莫不被教,多者或至礼、传,少者不失诗、论”^{[16]143}的教育方式,可以说存在云泥之别。刘宋皇室一味溺爱而不进行文化教育的家庭培

养方式无疑是失策的。

“夫风化者,自上而行于下者也,自先而施于后者也,是以父不慈则子不孝,兄不友则弟不恭。”^{[16]41} 颜之推认为,家庭教育的方式是通过父教育子、长教育幼的途径,下辈存在着一种效仿先辈的情况。刘裕以武力夺取政权,其后辈皇室中人自然对武力加以崇拜。少帝“有膂力,善骑射”^{[2]43},太子劭“尤爱弓马”^{[2]1615},前废帝曾入刘裕庙,指刘裕像曰:“此渠大英雄,生擒数天子。”^{[2]1452} 为将帅自然要注重武力,但作为国家的统治者徒有武力并不够。“宋武起自乡豪……其于家庭之教,固未暇及也,是以宫闱之乱,无复伦理。”^{[7]238} 不识礼法、不守伦理在刘宋皇室之中并非少见,国家统治者最重要的是治国安邦,进行国家建设,而信奉武力、肆乱宫闱,于家于国都是百害而无一利。刘宋一朝之所以皇室内斗不停,除了政治上士庶斗争影响之外,自身的家庭教育、家风建设也存在不足。刘宋统治者出自寒微,自身文化水平先天不足,致使刘宋皇室成员多数文化水平低,如彭城王刘义康“素无术学,暗于大体”^{[2]1184},晋平王休祐“素无才能,强梁自用”^{[2]1241}。皇室宗亲也是如此。长沙景王刘道怜“素无才能,言音甚楚,举止施为,多诸鄙拙”,且其人“贪纵过甚……去镇之日,府库为之空虚”^{[2]964}。

刘宋统治者自身文化水平不高,在延请教师上也存在不足。出于对高门士族的警惕和疏远,在皇室教育上,虽然任用高门士族担任教学师傅,实际上却更信任来自寒门的文士,更愿意让相同出身的人来教育自己的子弟,如王道迄本为寒人,“始兴王濬以为世子师”^{[2]1541},而寒人的文化水平整体上远低于士族,请寒族而不是士族来教育宗室子弟,显然不是最优选择。

刘宋多个皇帝都是从兄弟或者子侄手中夺得帝位的,故对宗室和大臣多加猜忌和防范,“宋武以猜忍起家,肆虐晋室,戾气所结,流祸过于后嗣”^{[7]241}。刘裕的猜忌以及过多的杀戮,“使他顺利登上了皇位,并巩固了刘宋皇权,但却造成其后国内政局动荡、树立国外死敌的重要原因”^[17]。孝武帝“睚眦之间,动至罪戮”^{[2]1532}。明帝因刘子勋与其争权失败,大杀刘子勋和徐武帝诸子,“泰始、泰豫之际,更忍虐好杀”^{[2]113}。刘宋统治者性格多疑,无论是对大臣还是宗室都不信任,君臣关系难以得到有效巩固。即使前帝为新帝设置的辅政大臣,也会在新帝继位之后掀起新一轮的君臣较量,造成君臣之间离心,使新帝的朝政出现危机^[18]。辅政大臣尚且使新帝的政局出现危机,其余大臣更是难以有亲信之感,怀疑之心更甚。

三、结语

南朝刘宋皇室乱局不断,致使正常的国家治理演变成了时断时续的权力斗争甚至血腥屠戮。刘宋皇室乱局的出现,既有外部原因,也有自身因素。值此魏晋南北朝社会大转型的历史时期,士族门阀势力日渐式微,出身低微的寒人强势崛起,直至刘裕建立起刘宋王朝。刘宋王朝的统治者本来出身低微,一旦置身士庶斗争的漩涡,不能有效引导和适应这种社会转型,其乱局可想而知。南朝刘宋皇室乱局可谓古今罕见,后世君王虽多引以为戒,但纵观整个封建时代,还没有出现能真正摆脱皇室乱局的王朝,只是乱局规模、持续时间各有不同而已。

参考文献:

- [1] 叶适. 习学记言序目[M]. 北京:中华书局,1977:447.
- [2] 沈约. 宋书[M]. 北京:中华书局,2000.
- [3] 王夫之. 读通鉴论[M]. 舒士彦,点校. 北京:中华书局,2013:397.
- [4] 范曄. 后汉书[M]. 北京:中华书局,1999:754.
- [5] 吕思勉. 两晋南北朝史[M].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350.
- [6] 李延寿. 南史[M]. 北京:中华书局,2000.
- [7] 赵翼. 廿二史劄记校正[M]. 王树明,校正. 北京:中华书局,1984.
- [8] 魏收. 魏书[M]. 北京:中华书局,2000:1454.
- [9] 田余庆. 东晋门阀政治[M].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
- [10] 川本芳昭. 讲谈社·中国的历史 05 中华的崩溃与扩大:魏晋南北朝史[M]. 余晓潮,译. 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4:129.
- [11] 王仲荦. 魏晋南北朝史[M].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377.
- [12] 余英时. 士与中国文化[M].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427-440.
- [13] 陈寅恪. 陈寅恪魏晋南北朝史讲演录[M]. 万绳楠,整理. 合肥:黄山书社,2000.
- [14] 何德章. 宋孝武帝上台与南朝寒人之得势[J]. 西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0(3):73-78.
- [15] 许嵩. 建康实录[M]. 张忱石,点校. 北京:中华书局,1986:395.
- [16] 颜之推. 颜氏家训集解[M]. 王利器,集解. 北京:中华书局,2002:143.
- [17] 杨恩玉. 刘裕的猜忌心理与用人政策探析[J]. 南京晓庄学院学报,2008(5):27-32.
- [18] 权家玉. 前朝柱石与新朝暗礁:南朝的顾命大臣探析[J]. 江西社会科学,2016(12):117-126.

[责任编辑 文 川]